

美國宋代研究的近況

Peter K. Bol*

在美國研究傳統中國歷史的各領域中，宋代史研究已成爲近年來最活潑，而且成果最豐碩的領域之一。新一代的學者繼 Edward Kracke Jr. 和劉子健等第一代宋史研究專家之後紛紛出現。受 Robert Hartwell 和他的學生們影響很大的宋代社會史研究，也深受學界注目。

本文的範圍只限於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的宋史研究書刊及論文。在這十年當中，有許多討論宋代對外關係、經濟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和哲學、宗教、文學和藝術的重要書籍先後出現，這些作者不約而同地，將他們關切的焦點放在傳統中國士大夫生活的政治面、社會面、文化面，和思想面。這樣的發展增加了進一步結合歷史、宗教、文學和哲學等不同學科的可能性，同時也激勵了學者以更具統合性的觀點，去了解傳統中國社會。

關鍵詞：宋史 社會史 思想史 文學史 宗教史 士大夫

一、概論

對於西方歷史學者而言，中國史是一難得的課題。因爲，整體而觀，東亞地區的漢文明可能是在國家創建史中最爲成功的一個例子。雖然，中國的文明顯然和西方不同，但是中國的歷史卻也證實了一些在所有複雜社會都可能發生的問題。例如，這些社會必須找出引導和限制政治權力的方法，她們必須確保利益分配與責任擔當的平均，她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東亞語言與歷史系

們必須維持社會秩序、創造和教導某套特定的道德觀念等等。這些問題在中國的歷史過程中，被理解和被陳述的方式，雖然和西方頗為不同。但無可懷疑地，這些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問題，不僅能使西方學者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同時也可以使西方學者對於西方的歷史掌握得更為透徹。然而，另外一個對西方學者而言的重大教訓，就是歐洲和美國的歷史過程不是無法避免的、更不是必然的、普遍的。我相信，一種包括漢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人類歷史觀點，將引導我們離開對單一而絕對之歷史規律的尋求，使我們不再認為人類只有一種進展的方式。換言之，這種觀點將使我們把人類的歷史看成是一種關於人類不斷做選擇的歷史。然後，被做成的選擇導致一些結果。這些結果雖然限制了我們未來發展的可能，但卻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因著往後的選擇產生進一步的變化。西方學者的問題，在過去一直是、而且將來也會是，去尋求一種較為錯綜複雜的觀點來理解中國史；以使得我們在思考人類歷史時，能認真地看待中國史。面對中國特別豐富的史料，這無疑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因而，如果西方學者期望能夠完成這件工作，則與東方歷史學界的合作將是無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偶而，中國來的訪問學者會問我，為什麼美國人會想要研究中國史。如前文所述，我會不加思索地回答：因為研究中國史有助於我們了解整個人類的歷史。有時候，也有人會問我，用英文來教中國史是不是真的可能。我想這個問題的本身要遠比它的答案來得有趣。但是，美國人究竟為什麼應該研究宋代的歷史呢？

一個學者限於自己的心力，當然不可能研究所有的事情。同樣地，一個歷史學者也不可能研讀所有和中國史有關的課題。在美國今日的學界，明顯地，大部分的學者研讀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和外交關係，或是中國現代史。所以上述的問題也許可以改做：為什麼那些有興趣研究中國十九世紀前的歷史的人對宋史感到興趣？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簡單描述美國近來宋代研究的近況。在最近的十五年當中，研究宋代專題學者的數量、和尋求宋代專家來作為近代史教職的大學的數量，都大大地增加。現在，幾乎在美國所有中國研究中心，都有專門研究宋史的歷史學者、和已在教學的研究生。這些研究生自然也意味著將來會有更多的宋史專家。這些中心包括：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密西根大學、史丹福大學、阿利桑那大學、伊利諾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加州大學、布朗大學、和哈佛大學。在這裡，我不想提到在這些大學裡的宋史學者的師承關係。我只想簡單地提一下，這一個研究領域的開發，要感謝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教授 E. A. Kracke、已故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劉子健，和已從賓州大學退休的 Robert Hartwell 教授。他們三位寬廣的興趣、淵博的知識和深入淺出的理論，使得他們能夠訓練出很多年輕的一輩。

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美國學者對宋代研究感到興趣？答案是他們起先並不是都對宋代感到興趣，而是對中國歷史在宋代發生的變化感到興趣。因而，許多宋代的歷史學者往前追溯到唐代去了解這些變化的根源，而且往後探尋到元、明去了解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後果。而且，宋代留下的豐富史料，使得我們可以以它作為一個基礎來研探後來發生的變化。

我們對宋代所發生的變化和它為接下來一千年的中國歷史留下的精神遺產的理解，很多都要歸功於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在文化方面，科學擴張成為地方社會的一種機制，而且不斷刺激著公私立學校的成長；道學的興起及其與科學、學校組織之間的複雜關係；詞這種新的文學形式的出現、與文人畫這種新美學的產生。在外交方面，北方部落邦聯變為國家的形式，而且以文明的方式來統治；這個事實和多國政治都標誌著對鄰邦關係的成形。在經濟方面，經濟不斷地商業

化與貨幣化。在政治方面，政府越來越官僚化，政治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宗教方面，我們看到禪宗成功地得到國家的庇護，而道教的全真教也開始出現。當然，我們還看到貴族的沒落。從宋代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有不少後來十六、十七世紀的歷史學家看到的獨特的變化其實都已經在宋代發生過。所以，就歷史學者特別注重變化來講，宋代是一個充滿頗具研究價值之題材的時代。

下文即是對西方的宋代研究作一概略的結論，並且以美國學者過去十年來印行之英文著作的書目為主，介紹一些研究的例子與方向。這些著作大部分都屬於新一代學者的作品。因此，不是對美國宋代研究之學術史作一完整的概觀；因而下文也將不會提到許多其他發表在定期刊物的單篇論文。在討論過這個領域的研究之後，我將提到一些歐、美歷史學的潮流，尤其是現在流行的「後現代主義」。並且以思想史為例，來討論這思潮如何影響到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想法。

二、美國的宋代研究

本文簡單的結論即是：大部分美國學者對宋代的研究，實際上都和所謂的「士大夫」(士人)和他們的文化有關。筆者用英文字「*literati*」來指在宋代形成的政治、社會、文化菁英。「*Literati*」暗示著那些熟於詩書、能夠寫作的人。不過，我不是指「文人」。「文人」只是「*Literati*」中的一小部分。相反地，我會把所有接受過科舉教育、並藉此來追求科名的人當作「*literati*」。雖然我們可以想到大部分榜上無名的應考士人或多或少有一些作過官的親戚，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考生可以通過考試成為官員。在十三世紀左右，大概有一、兩百萬的人可以聲稱他們是「士人」。「士人」是一種社會群體而不是一種經濟階級；但是經由教育，他們卻分享著一種共同的認同感。在宋代，

他們怎麼叫這些知識分子呢？他們就是那些被稱為「士」或「士大夫」的人（筆者也注意到，在宋朝，「士」也被用來稱呼準備科舉考試的學生）。無論如何，下列的說法是公平的：西方的宋代研究實際上是關於知識分子——也就是士人——的文化、政治和社會關懷。雖然，這不是有意造成的。確認了這個事實，將有助於我們避免將士的生活和其他一般大眾的生活混同起來。而且一旦我們將士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區分開來，我們就會知道：對其他社會群體扮演主角的事物我們其實了解得很少。筆者即從事於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的思想史研究，至少有兩個理由使得筆者覺得這種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在了解歷史的演變時，我們必須注意那些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第二個理由是在使用史料時，我們需要了解這些史料記錄者的背景和想法，而大部分的史料都是士人寫的。

這個關於美國研究士人的總結，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對於宋代與其鄰邦關係的研究，如遼、西夏、和金，明顯地超越了對士人生活的研究。宋朝如何應付一個多國世界的現實問題是兩本書的主題：那就是由中亞細亞專家 Morris Rossabi 編的《中國與其敵國》和陶晉生的《兩位天子：宋遼關係研究》。但是既然士人是中國國內所實行的禮儀和家庭制度之文化模範的護衛者，這個問題也不能全然說和士人無關。Richard von Glahn 的《溪峒之國：宋代四川邊境的擴展、殖民與開化》描述了宋代與鄰邦關係中較強硬的一面，那就是在十一世紀時的邊境，宋朝有時會以殘暴的方式強佔原住民的土地以擴張宋朝的疆域。

另外一個和士人較少關係的研究領域是宗教。和中世紀佛教研究比起來，過去幾乎沒有任何談宋代佛教的書被出版過。但是，在將來的幾年之內，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關於宋代名僧的書。這些名僧在士人當中都評價很高；例如契嵩、惠弘、和大慧。另外有一本關於宋代禪

宗的組織與神話(傳說)也會出版。Thomas Cleary 已經翻譯了惠開的《無門關》。關於學僧和士大夫的知性往來問題則還有更多的工作等待被完成。關於道教的研究不多，但是 Judith Boltz 的《十到十七世紀之道家文獻概觀》是關於一些值得研究的材料的廣泛介紹。

至於一般大眾的價值取向和文化活動的研究，「民間宗教」是一個非常有希望的領域。在她的《變化中的神在一一二七到一一七六年的中國》，Valerie Hansen 特別對一些民間宗派的改變和加速的商業化之間的關係感到興趣。當然，我們也知道有些士大夫家庭，或甚而是一些高官，也參與了民間宗派；而且也做了不少現代人認為只是「迷信」的事。此外，一些士大夫也常常出力為地方神明爭取官方正式的榮譽頭銜。

眾所皆知，宋代經濟主要依賴農夫的勞力和商人的貿易。不過，在美國由 Robert Hartwell 和他的學生所領導的宋代經濟研究，卻著重在「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下面兩本在這研究範圍的書都認為國家運作的方式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Hugh Clark 在他的書《團體、貿易與貿易網絡：三到十三世紀的福建南部》中，檢討福建南部經由貿易而帶來的經濟繁榮和它的蕭條。他將蕭條的原因都歸罪於朝廷對泉州港貿易的榨取。Paul Smith 則討論西北和四川茶馬司的問題。在他的《向天府之國徵稅》裡，則指責政府，尤其是王安石的新政，破壞了四川的茶業。在這方面，有些美國學者深受司馬光對新政批評的影響。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可以在法政系統看出。Brian McKnight 寫的《宋代的法律與秩序》是對整個宋代法政措施的概觀。他強調在上流社會的人如何利用這些措施來維持社會秩序；但他同時也注意到了士大夫用來維持社會秩序的教化和刑法之間的緊張關係。McKnight 和已故的劉子健教授也已經在從事《欽命集》的翻譯。

也許，在政府與社會關係問題上，最重要的作品是《經世濟民：

宋代關於政治與政策的論述》。這本書由 Conrad Schirokauer 和 Robert Hymes 編輯，明顯地承認政府組織無論是在理論上或在實際運作上都是一種士的活動。將這本書所收的論文總合來看，主要的一個觀點就是士大夫對於治理天下的方式，由北宋的主動進取、中央領導，轉變成南宋的保護地方利益、追求地域式的解決方式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福利。

還有一些其他的書提到政府的運作。羅文寫了一本有用的《宋代文官制度介紹》，說明了宋朝如何經由科舉選拔官員來建立整個官僚體系的權威。這是在繼 Kracke 四十年前的《宋代初期的文官制度》之後，第一本有關官僚體系的著作。劉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國轉變向內》中，主張伴隨著高宗的復位，中國開始往內看而心胸變得較為狹窄。他也討論了皇帝如何利用替身，例如秦檜，來集中權力。Jennifer W. Jay(謝慧賢)的《改朝換代：十三世紀中國的忠誠》則討論宋朝的忠誠的觀念。這尤其是和士人相關的一種現象。

至於文學和藝術，更是和士人階層有關。下列關於歐陽修的文學作品、蘇軾的詩、范成大的遊記和詩以及吳文英的詞的書，都想要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和欣賞有所貢獻。但是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這些書也可以被認為是對文學文化的研究。今天，讀蘇軾的詩或是歐陽修的散文的人或許非常廣泛。但是，大部分的學者應該會同意當初他們的作品只是寫給士人讀的。而士人也對他們的作品感到興趣，因為他們作品的內容都切合當時士人關心的課題。同樣地，畫雖然不是士人本身的作品，但是畫的主題卻常常是從士人文化中產生，而畫主要也是用來吸引士人。例如 Maggie Bickford 在她的書《冰魂玉骨：中國藝術中的李花》中說明在宋代關於李花的畫重複了在詩中發展的李花的主題。Jullia Murray 也強調馬和之的詩經圖繪是南宋復國文化計劃中的一部分。而 Susan Bush 和她的《初期畫論選》中的翻譯，也提

醒我們，在宋代，士人的藝術評論也大量地增加。

筆者像大數的讀者一樣，是一個蘇東坡迷；而不是黃庭堅、陸游、楊萬里、或是范成大的崇拜者，雖然他們都已被廣泛地研究過。但是，在文學研究中，關於賞析的書(大部分的書都是這類書)和以特定作者為對象來討論文學理論問題的書之間，還存在著一道鴻溝。Michael Fuller的《通往東坡之路：蘇軾詩風的發展》比其他的書更用心在展示：「一個中國詩人和中國詩，有一些東西要向任何一個有自覺的詩人的個人風格的發展感興趣的人說」。但是這本書同時也對蘇軾元祐以前的詩做了許多的賞析與翻譯。對於歷史學者的挑戰，是去了解在那個時代的個人如何利用「文」的創造技巧和「士」的社會地位在知識文化界中立身。

就如歷史學者能將一首詩讀成是一個人對特定環境的反應，或將它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來評價它；所以我們也可以將一些哲學的陳述，既看作是中國哲學史的一部分，又可以將它看做是一種積極的知識行為，用來說服別人去接受一種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觀點。例如「道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最具哲學性的儒學思想家可以從哲學的觀點，被學者當成中國哲學史的一部分來研究，也可以被當成社會的一分子，積極地參與當時的各種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的主體。前者如 Ann Birdwhistell 在她的《到理學的變遷：邵雍論知識與實在界的象徵》，以《皇極經世書》來探討認識論的問題。此外，最被廣泛研究的人物無疑是朱熹。Donald Munro 在他的書中，《人性的意象》，主張朱熹用「意象」來遮掩他邏輯上的不連貫。陳榮捷也曾經寫過朱熹的哲學和傳記。他所編的國際會議論文集，《朱熹和理學》，也同時涵蓋了哲學和歷史事實的討論。後者如稍後由 Wm. Theodore de Bary 所組織的國際會議，有許多年輕的學者參加，他們注重的是理學家的教育而不是哲學。這些研究後來收在由 Wm. Theodore de Bary 和

John Chaffee 編輯的《形成階段中的理學教育》。Daniel Gardner 也將重點集中在教育的一面來談朱熹。他的第一本書是關於朱熹的《大學章句》，第二本書則是翻譯和介紹《朱子語類》中和「學」相關的條文。De Bary 教授以宋明理學的研究而出名。在過去十年中，他大概出版了六本書。他最近一本書，《理學中心的意旨》，特別著重在宋代理學傳統。他強調在理學傳統中「理學」與「心學」根本的統合和其中一些觀念的普遍價值。

有些學者則較著重在宋代知性文化中的差異。在《宋代時易經的運用》中，Kidder Smith、Peter Bol、Joseph Adler、和 Don Wyatt 討論邵雍、蘇軾、程頤、和朱熹對《易經》的不同詮釋。Hoyt Tillman 在他的《儒學的論述和朱熹的獨尊》中，討論朱熹和其他幾位人物的爭論。這些人物包括張栻、呂祖謙、陳亮、陸九淵。筆者則是一個少數對理學運動之外的人物感到興趣的人。我的書《「斯文」：唐宋思想變遷》討論唐朝早期和晚期的文學家和北宋主要的思想家，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和程頤。順著這樣的發展，筆者提出兩點意見：第一、我們應該將唐宋士人的思想變遷了解成是從文學轉變到道學而不是從佛學轉變到儒學。第二、道學在士人得到的勝利和宋代全國性菁英的社會轉型有關。

依筆者的觀點來看，最令人興奮的宋代研究領域是社會史的研究。西方社會史家現在已經了解他們的工作事實上一直是和作為一種社會群體的士有關。為什麼這值得興奮？首先，因為它使我們看到社會的變遷如何和文化的變遷相關，而不將文化的改變視為只是社會利益的一種作用。一個具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的群體的存在社會中，是一個文化事件，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事件。在我稍後的講演裡，我更詳細地來討論這點。例如，Patricia Ebery 在她對袁采《世範》的翻譯和研究中，強調「士大夫」作為一種認同感，而非一種階級。在《帝

制中國下的儒學和家禮》中，她並且將對於家禮興趣的恢復關聯到這個群體的生存。在此也應該提一下她將要出版一本關於宋代的女性的書，它將會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婦女在士大夫家庭中被期待扮演的社會角色。

新的社會史第二個值得令人興奮的面相是對傳統歷史解釋模式的挑戰；在傳統模式中，宋代科舉的擴張將社會流動制度化。例如，John Chaffee 的書，《宋代科舉》，以資料證明了利用像別頭試這樣不公平的評量方式來偏袒官員的兒子。Chaffee 現在正在準備寫一本關於宋代最成功的家庭的書，那就是皇帝的家族。也許，我們會對社會流動這麼感到興趣是因為它是我們現代化概念中一個基本的面相。但是，這種興趣卻模糊了下列的事實：科舉與學校教育不是被用來完成一種社會功能，而是為政府尋找好的人材和宣揚道德，就如李弘祺在他的《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所說的。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傾向於假定士的作為就和世界各地的菁英的作為一樣。他們設法要確保自己的特權能留傳給自己的子孫；而且希望能維持他們家庭的傑出地位。在《宋代的朝廷與家庭：明州史家的仕途與其親屬的前途》。Richard Davis 對史氏家族的研究，如史浩與史彌遠，顯示出有些家庭非常會從制度中得到好處。

但是，那些想要延續自己地位的菁英，必須在如何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上作一選擇。在經過大量的收集傳記資料之後，Robert Hartwell 得到的結論是，北宋和南宋的士人達到這個目的的策略有所改變。這個結論和其他一些問題是在他的一篇重要論文〈七五〇年到一五五〇年中國人口、政治和社會的轉型〉中的主題。在一本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書，《政治家與士紳：北宋與南宋時的撫州菁英》，Hartwell 的學生 Robert Hymes 提出這個士人延續自己地位的策略的改變，是從北宋官僚家庭間的互相通婚，轉變到南宋時的發展地方關係和地方勢

力。而且，Hymes 還陳示了士人如何利用地方防衛、教育、宗教贊助等等活動的領導地位來保持他們作為地方菁英的地位。他建議這就是道學在士人之間得到的一個基礎的社會脈絡。

這些研究成果使西方學者不再假設一些關於社會應然的儒學主張可以告訴我們關於中國社會的實然。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兩萬到三萬的官員只是士這個群體的一小部分；也才開始明白，要解釋一個這麼小的政府如何維持那麼龐大的國家制度，一定要考慮到那些成千上萬、名落孫山的人卻仍然不斷地想被當成士來對待的事實。只要避免假設士人就是所有的人口，從研究這個群體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活動，我們應該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三、歷史學上的一個轉變

下文筆者將談談一種在西方歷史學慢慢形成的新取徑。筆者對這種新取徑的了解受到自己對於思想史之興趣的影響。就如下文將提到的，這種取徑給予思想史一很重要的地位。事實上，這種新取徑是我們對於社會和文化關係想法的一種改變。舊的觀點認為文化只是更為真實、和更為基層的社會和經濟利益的反應。但新的觀點卻正好相反。新的觀點主張社會實際上是文化的產物。較簡單而具文學性的說法就是，「社會是文化的產物」。很早以前，莎士比亞就說過：「人世只是一場戲」。因而如果我們要了解活在這場戲中人，就要根據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去了解。若以儒家的例子來說：父子有生物性的關係是一非常明顯的事實，因為所有的兒子都有父親。但是在宋代，怎麼樣才叫做一個兒子、怎麼樣才叫做一個父親和社會期待一個兒子或父親應該如何言行，卻和一千年前或一千年後都不樣。除了時間上的差異之外，它也可能因為地域和階級而有所差異。同樣地，「家庭」似

乎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實體。但如果將一個中國家庭和一個美國家庭相比，家庭成員如何在實際上如何舉止不是取決於生物學上的關係，而是被文化創造的規範所引導。在這個意義之下，文化創造了那被我們認為真實並稱之為「社會」的角色。

這種新的取徑有很多的名字，例如「新文化史」或「後現代主義」。筆者認為它給予思想史很大的影響。事實上，它使思想史變得更為重要；因為思想史研究的是價值和規範在思想上如何被定義和如何轉變的問題。而且，思想史家經常處理的是知識上的菁英，也就是那些在歷史上宣揚新觀念和新的可能性、而且常常在文化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但是，新文化史的興起也已經開始在改變我們做思想史的方式。

當然，西方思想史學者並沒有忘記思想史的傳統課題：共同的價值觀、大思想家、哲學家。但是我們已經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這些課題。那就是，我們開始著眼於思想史中的主要變遷。換句話說，我們承認那裡有共同的價值觀和觀念，但我們的興趣是在於它們如何被建立和如何改變的問題。又如改變中的時代的重要人物——那些活躍在有很多不同可能性的時代中的大思想家。但是現在我們開始把思想家看成是試著要去說服別人來分享一些理念、而有時候會用繁複的哲學體系來正當化這些觀念的人。簡單地說，我們將思想史的故事看成下列這些人的故事：當面對競爭時，他們試著建立起和諧；當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差異時，他們試著創造統一；當面對斷裂時，他們試著建立起連續。換言之，思想家不斷在創造和轉變文化來反應他們自己時代的課題。

程頤用「理一分殊」來說明張載《西銘》中的思想體系。若將這個詞，套用在上面所說的理論上，也許受到這樣的質疑：就算每個人都同意「分殊」是歷史的事實，但我們要怎麼來處理「理一」這個觀

念？西方學者的處理方式是將「理一」看成一種某些人要說服別人分享的信念，而不再只將它當成是不證自明的真理。如此，西方學者將被導引到另外一些新問題上。例如：為什麼那些思想家要去說服別人來接受他們的信念；如果別人接受的話，也需進一步問為什麼這些被說服的人最後選擇接受而不是排拒。但還不只如此，當那些思想家只做了一些正面聲明時，西方學者仍會問到底他們在反對什麼。當人們接受了這些聲明時，西方學者則會問，這些人們的其他選擇是什麼。簡單來說，西方的學者不再假設思想家的觀念是真的，而是將他們視為接受一些特定信念的抉擇，而這抉擇同時也意味著對其他信念的捨棄。

一旦採取這種觀點，也就是理念的擴展是說服的結果，而不是理念本身具備了真理的力量(即使是真理，我們也要經過學習來了解它是真理的這個事實)，西方學者開始將眼光超出思想家本身，而看到他們使用或創造來說服別人的工具。拿道學來講，這意味著他們使用的語言(例如是語錄，而不是議論文章)、他們機構化的活動(例如出版、建立書院)、他們的人脈關係(這種關係將高級官員聯繫到在村莊裡的低階層士人)、對於關於他們自己的傳說的宣揚(例如，蓋廟來尊崇他們自己的老師)等等的活動。但是道學家當然也想要說服士人去思考某些特定的事物；關於他們認為對的事情，他們有一定的立場。問題是為什麼這些觀點在這個時候、對這些人來說是受歡迎的。例如，為什麼一個反對在地方社會採取如新政般的有為政策的運動，會得到一些地方菁英的支持。這樣的問題無疑地會帶領我們進入社會史的領域。但是，對道學擴展的說明也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到文學史上，因為我們必須問為什麼一個否認文學是一種真學問、並且反對科學的運動能受到士人的歡迎，而這些士人正是從事文學寫作、在科場裡互相競爭的人。但是如果我們要問道學有什麼理由輕視文學，就應該也要問其他人有什麼理由來支持文學的寫作。亦

即我們應該也要探尋那些爲道學家所反對的人用來肯定自我的理由。

在這種取徑下，中國士人社會和文化的關係模式，將會是一充滿衝突而不是和諧的模式。同樣地，人類事件的常道，將會偏重在多樣性而不是一致性，斷裂性而不是連續性，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相同的意見。但是不管在西方或東方的思想史當中，人們想要設法使別人同意自己、從不同中創造一致、在不連續中尋求連續的故事絕對不是一小部分。對宋代的思想家來說，諸子百家的多元性標誌著周之衰。同樣地，佔據著道學核心的是那個自孟子之後，聖人之道已經不傳的宣稱。在此宣稱中，有著一種渴望，要回到一個無知、不自覺的聖人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人自然而然地就是良善的。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觀點來看，令人著迷的是，他們成功地在一些時代說服一些人去相信這是可能的，而且當他們試著要去從事道學教育的時候，不論是個人還是群體的想法與行爲都發生變化。而歷史學者的責任，就是去解釋爲什麼它會這樣發生。但在到達這個地步之前，我們卻必須首先同意這些需要被解釋的事情的存在。

Books on Sung Period Subjects by American Scholars, 1983-1993

近十年來美國宋代研究之書目

外交關係

1.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對等之國中的中國》) (California, 1983).
2. Tao, Jing-shen (陶晉生),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宋遼關係研究》) (Arizona, 1988).
3. von Glahn, Richard,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ung Times* (《宋代四川邊境的擴張、殖民與開化》) (Harvard, 1987).

宗教

4. Hui Kai (惠凱), *No Barrier: Unlocking the Zen Koa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Zen Classic Wumenguan* (《無門關》) (Bantam, 1992).
5. Boltz, Judith, *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10th-17th Centuries* (《十到十七世紀之道家文獻概觀》)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32)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6. Chang Po-tuan (張伯端), *Understanding Reality: A Taoist Alchemical Classic (Wu chen p'ien)* (《悟真篇》), translated by Thomas Cleary (Hawaii, 1987).

7. Hansen, Valerie,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67* (《變化中的神》) (Princeton, 1990).

經濟史

8. Clark, Hugh,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三到十三世紀福建南部的團體、貿易與貿易網絡》) (Cambridge, 1991).

9. Smith, Paul,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 (《向天府之國徵稅》) (Harvard, 1991).

政治史和制度史

10. Conrad Schirokauer and Robert Hymes eds., *Ordering the World: Discourses on Government and Policy During the Sung* (《經世濟民：宋代關於政府和政策的論述》) (Forthcoming, California, 1993.)

11. Jay, Jennifer W.,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ty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改朝換代：論十三世紀中國的忠臣》) (Western Washington, 1991).

12. Liu, James T. C. (劉子健), *Chinese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中國人轉變向內》) (Harvard, 1988).

13. Lo, Winston W. (羅文),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in Sung China: With Emphasis on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宋代文官制度介紹》) (Hawaii, 1987).

14. McKnight, Brian, *Law and Order in Sung China* (《宋代的法律與秩序》) (Cambridge, 1992).

文學

15. Chen Yu-shih (陳幼石), *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Studies of Four Masters* (《韓柳歐蘇古文論》) (Stanford, 1988).
16. Cryer, James trans., *Plum Blossom: Poems of Li Ch'ing-ch'ao* (《李清照的詩》) (Carolina Wren press, 1984).
17. Egan, Ronald C.,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歐陽修的文學作品》) (Cambridge, 1984).
18. Fong, Grace, *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oetry* (《吳文英與南宋詞》) (Princeton, 1987).
19. Fuller, Michael Anthony,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h's Poetic Voice* (《蘇軾詩風的發展》) (Stanford, 1990).
20. Hargett, James M.,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范成大的遊記》) (Steiner, 1989).
21. Schmidt, J. D., *Stone Lake: The Poetry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范成大的詩》) (Cambridge, 1993).

藝術

22. Bickford, Maggie et al.,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中國藝術中的李花》) (Yale, 1985).
23. Bush, Susan, and Hsio-yen Shih, *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 (《初期畫論選》) (Harvard, 1985).
24. Lackman, C., *Evaluations of Sung Dynasty Painters of Renown: Liu Tao-ch'un's Sung ch'ao ming hua p'ing* (《劉道醇的宋朝名畫評》) (Brill, 1989).

25. Murray, Julia K., *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馬和之與詩經圖繪》) (Cambridge, 1993).

哲學和思想史

26. Birdwhistell, Ann, *Transition to Neo-Confucianism: Shao Yung on Knowledge and Symbols of Reality* (《邵雍論知識與實在界的象徵》) (Stanford, 1989).

27. Munro, Donald J., *Images of Human Nature: A Sung Portrait* (《人性的意象》) (Princeton, 1988).

28. Chan, Wing-tsit (陳榮捷), *Chu Hsi: New Studies* (《朱子新探索》) (Hawaii, 1989).

29. Chan, Wing-tsit (陳榮捷),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朱熹的生平與思想》) (St. Martin's, 1987).

30. Ch'en Ch'un (陳淳), *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 (The Pei-hsi Tzu-ij) by Ch'en Ch'un, 1159-1223* (《北溪字義》), translated by Wing-tsit Chan (Columbia, 1986).

31. 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朱熹與理學》) (Hawaii, 1986).

32.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在成形階段的理學教育》) (California, 1989).

33. Gardner, Daniel, *Chu Hsi and the Ta-hsüeh: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朱熹與大學》) (Harvard, 1986).

34. Gardner, Daniel, *Chu Hsi. 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 (《學爲聖人：朱子語類選》),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Daniel K. Gardner (California, 1990).
35. Ebrey, Patricia Buckley trans.,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century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 (《朱子家禮》) (Princeton, 1991).
36. de Bary, Wm. Theodore, *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理學中心的意旨》) (New York, 1989).
37. Ch'eng I (程頤), *I Ching: The Tao of Organization* (《易傳》), Translated by Thomas Cleary (Shambala, 1988).
38. Kidder Smith, Peter Bol, Joseph Adler, and Don Wyatt, *Sung Uses of the I Ching* (《宋代對易經的運用》) (Princeton, 1990).
39. Tillman, Hoyt C.,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 (《儒學的論述與朱熹的優勢》) (Hawaii, 1992).
40. Bol, Peter K.,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從唐到宋的思想變遷》) (Stanford, 1992).

社會史

41. Ebrey, Patricia Buckley, *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 Yü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 (《袁采的〈世範〉》) (Princeton, 1984).
42. Ebrey, Patricia Buckl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帝制中國下的儒學與家禮：從社會史看禮儀的寫作》) (Princeton, 1991).

43. Chaffee, John,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宋代教育的窄門：從社會史看科舉》) (Cambridge, 1985).
44. Davis, Richard L.,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of the Shih of Ming-chou* (《明州史氏的仕途與其親屬的前途》) (Duke, 1986).
45. Hartwell, Robert,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七五〇年到一五五〇年中國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2 (1982), pp. 365-442.
46. Hymes, Robert,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政治家與士紳：北宋與南宋時江西撫州的士人》) (Cambridge, 1986).
47. Lee, Thomas H. C. (李弘祺),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 Sung China* (《宋代教育與科舉》) (Chinese University, 1985).

其他

48. Bol, Peter K., *Research Tools for the Study of Sung History* (《宋史研究工具書書目》) (Journal of Sung Yüan Studies, 1990).
49. Kinugawa Tsuyoshi ed., *Collected Studies on Sung History Dedicated to Professor James T. C. Liu in Celebrat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劉子健教授七十壽辰紀念論文集》) (Dohosha, 1989).
50. Ting Ch'uan-ching (丁傳靖),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宋人軼事彙編》), trans., by 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St. John's, 1989).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merican Study of Sung China

Peter K. Bol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The study of the Sung perio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fields in the study of pre-modern China. A new and larger generation of younger scholars has succeed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ung period specialists represented by Edward Kracke, Jr. and James T. C. Liu. It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or new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lites in particular, and area much influenced by Robert Hartwell and his students. This article only treats books written between 1983 and 1993. Important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in many fields,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economic history,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art. Although it cannot be said that scholars in these various fields share an intellectual program, their work taken as a whole is predominantly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v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ite, the literati (*shih-ta-fu*). This development facilitates efforts to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eparate disciplines of histor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nd encourages a more integrated view of traditional society.

Key Words: Sung history, social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literature, religion, elites, literati